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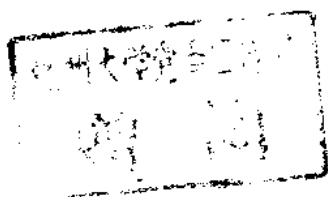
党史资料

政治理论教学参考资料

(一)

目 录

- 关于瞿秋白问题的几点看法……刘 炼 (1)
-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包惠僧 (26)
- 党的“一大”为什么选陈独秀
当总书记……范守信 (38)
- 刘少奇新传……王 毅 (42)



杭州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

一九八〇年一月

23-5

16

关于瞿秋白问题的几点看法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在安徽省中共
党史学习研究会成立会上的报告

刘 炼

瞿秋白同志的评价问题是党史教学中的一个难点，也是被“四人帮”搞得比较混乱的问题，他们对瞿秋白作了根本的颠倒：革命者变成了“叛徒”，“反革命”，党内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一时犯了错误，就全盘否定其一生。这不仅是否定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肆意破坏党内斗争的正确传统，根本背叛了关于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因此正确评价瞿秋白，是党史教学研究中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问题。

怎样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评价一个人呢？毛泽东同志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从瞿秋白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他是对党对革命有重大贡献的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也犯过错误，有功有过，功大于过。他牺牲时仅三十七岁，二十一岁参加五四运动，革命生涯十六年，十五年间写了大量（约六百余篇）宣传马列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论文和译著，以及文艺杂文等。从瞿秋白的著作和革命实践来看，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一）五四时期，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是北京学生领袖之一，是我党最早一批具有初步共

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之一；（二）他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苏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三）他对建立反帝反军阀的统一战线，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四）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五）十年内战时期，他和鲁迅一起进行革命的文化斗争。以上是瞿秋白的主要功绩。另外一方面，他也犯过错误，也有过动摇，他是第一次“左”倾路线的主要负责人，由于他推行的盲动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继续遭到挫折和损失。此外，他被捕后，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作了严格的自我解剖，同时也表现了思想上的动摇，后被敌人利用，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的影响。

总之，瞿秋白在当时是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对党对革命有重大贡献，一九三一年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以后仍继续参加文化斗争，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现在分别就以下七个问题介绍一些情况，讲一些看法。

一、五四时期，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到接受马克思主义

瞿秋白在五四时期是我国最早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五四运动是瞿秋白思想变化的转折点，开始了思想发展的崭新一页；由消极“避世”走向群众运动的洪流，由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走向科学共产主义。从一九二〇年开始，由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瞿秋白思想转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地考察十月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另一个特点是把自我改造和参加改造社会的斗争结合起来，比较坦率地作自我思想解剖。

五四运动以前，瞿秋白的思想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少年时期

有反抗精神，同情革命党和辛亥革命，在常州第五中学读书时，曾大胆地写诗作文驳斥反动教员对辛亥革命的攻击，受到记过处分也不屈服；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也受到复古思想的影响，加以母亲因贫困自杀，给他很大刺激，从而产生了消极的“避世”思想，一度埋头读古诗词，研究佛学“试解人生”。反映出瞿秋白不满现状又找不到出路的矛盾心理。

一九一六年瞿秋白到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阅读了许多托尔斯泰的作品，接受了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五四运动冲破了瞿秋白思想矛盾的罗网。他热情地参加五四运动，被推选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代表，参加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积极领导学生运动，参加了五四天安门学生集会和游行，曾被拘捕，他带领同学坚持斗争，后被释放。五四运动促使瞿秋白深深思考一个问题：即中国社会腐败之极，必须改造。于是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组织进步社团“社会实进社”，创办《新社会》杂志，瞿秋白是主要编委和撰稿人之一。《新社会》是五四时期重要进步刊物之一，读者远及四川、广东、东北、上海各地。先后出了十八期。（自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二〇年五月）瞿秋白几乎每期都写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清楚看出瞿秋白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开始“迎接”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

（1）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五四运动后，七月十七日瞿秋白在《晨报》发表文章抨击北京军阀政府的妥协政策。当时北京政府虽然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但是在“消弭民气”之后，就与日本帝国主义就山东问题进行“直接交涉”，并“补行签字”，瞿秋白继续斗争，揭露北京政府的“直接交涉”和中日军事协定是变相的“二十一条”，“有碍中国主权”，应当取消。并告诫国民不要对帝国主

义和军阀政府抱任何幻想，他抨击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和威尔逊所发明的“方程式”都没有用，都不可信，北京政府也“万不可靠”，只有各界群众团体组织起来，坚持斗争，就能取得胜利。他进而通过总结历史经验阐明依靠群众的思想。他认为五四以前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革命运动都是不彻底的，主要原因是“君子小人主义”，这是“根本上的错误”。（《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三期）所谓“君子小人主义”，就是依靠“君子”去解放“小人”，而不能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这时瞿秋白仅二十一岁，辛亥革命才过了八年，这个认识是很深刻的。因此瞿秋白认为五四群众运动必须进一步发展到社会运动，面向平民劳动者。

这样，《新社会》一开始就确定了向大多数平民宣传新思潮的方针。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新社会》编委到箭竿胡同访问陈独秀求教，陈独秀提出：希望《新社会》办成给劳动界灌输新知识的通俗报纸，社会改造运动要做切实的工作，不要说空话等。（见《新社会》第三期）于是瞿秋白、郑振铎等就提出号召青年到边疆去到农村去搞平民教育，学习俄罗斯青年男女去与农民为伍的精神。主张知识青年和劳动者结合，这是五四时期彻底民主主义思想的表现。

（2）一九二〇年初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瞿秋白总结五四运动的一条经验教训是：不能只靠一时的群众运动，而要“创造新信仰”，这个“新信仰”是什么呢？瞿秋白作了认真的探索。五四以后，他研究了新思潮中各种流派和各种社会改造的方案，特别对社会主义的讨论，他最有“兴味”。他研究过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研究过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也研究过当时流行的“新村运动”（即一些不满资本主义现实的人，幻想在旧制度下建立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实验区”。）瞿秋白、郑振铎等人对中国劳动者的生活做了一些初步

调查，同时分析了美国宗教新村运动和日本、托尔斯泰的新村运动，他看到新村运动多半失败，只不过是“新式理想的‘桃源’而已”，不可能解决整个社会的劳动阶级问题。经过一番探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是不可少的”，是“较易进步的办法”，是“直接对劳动阶级有利益”的社会革命运动。这时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研究科学社会主义。

一九二〇年四月以后，《新社会》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劳动问题，十七、十八、十九期，出了三期劳动专号，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罢工斗争，研究了中国的劳动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制度，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国家学说等等。这时瞿秋白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并渴望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二〇年十月，决心去苏维埃俄国作实地考察，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 and 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目的很明确，是企图为中国“辟一条光明的路”。

所以说瞿秋白自一九二〇年初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此后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二、热情赞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瞿秋白是继李大钊之后大量地热情地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一个杰出的代表。据不完全统计，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他先后写了介绍十月革命经验和马列主义理论的文章有六十多篇，另外还有八十多篇译文。仅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期间，就写了三十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

当时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是到日本或欧洲去（法国、德国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解十月革命。瞿秋白则是直接到俄国去。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当时的志愿，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

日毛泽东给周士钊信中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这个计划终未实现。半年后，一九二〇年十月，瞿秋白启程去俄国实地考察。

当时去苏俄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新思潮广泛流传，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引起北京军阀政府的恐慌，三令五申通电全国各省“严禁过激主义”，并在中俄边境防堵俄境华工回国和中国工人去俄国。同时，当时俄国内战尚未停止，经济十分困难，外国资产阶级称苏维埃俄国为“饿乡”，称布尔什维克为“穷克”。瞿秋白不顾重重困难，毅然决然去苏俄研究了解“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业”。自己携带粮食，经过三个多月才到达莫斯科。先后住了两年，写回大量报导在《晨报》陆续发表。

在这些报导中，瞿秋白热情地歌颂十月革命。他称赞俄国全面地改造社会建立了新的“劳农国家”，是“二十世纪历史的事业之第一步”，俄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他以专篇报导赞扬列宁是“伟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真正是工人的政府，红军是劳动群众的保护者。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的，“走俄国人的路”是先进中国人得出的共同结论。瞿秋白当时也是如此，他说十月革命的“一线光明”，“必将照遍我的同胞兄弟们。”

在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同时，瞿秋白经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和观察，比较实事求是地全面地介绍了革命初期苏维埃俄国的实际情况。写了光明面，也写了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刚从旧俄国脱胎出来的苏维埃共和国，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加上国内战争和严重饥荒，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当时对苏俄的报导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反动派的污蔑，说革命后的俄国是“独裁制”、“过激党”，是“洪水猛兽”等等。一种是资产阶级记者，也客观报导些革命后的进步，但怀疑苏维埃国家克服困境的能力。瞿秋白则是采取“世间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介绍俄国革命后的艰辛，共产政策的发展，以及新生

的苏维埃国家不可避免尚存的黑暗面（如官僚主义等）。

应该指出，瞿秋白在报导中初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不同阶层的人们作了不同的分析。一种是托尔斯泰的亲友们，成天骂革命政府，对苏维埃制度不满。瞿秋白分析说他们是维护着“旧时代的俄国”，是贵族的代表。一种是小资产阶级，商人和农民，反对“粮食均配法”，后来改为“新经济政策”，态度就有了转变。再一种是上层知识分子，大多跑向国外，“不来帮着人民共负大业”，瞿秋白对他们持批评态度。而红军士兵和工人阶级对苏维埃国家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他们说粮食不够吃，大家都一样，不能只想到“我”，这样一个大革命，“那能一跳便入天堂！”坚定地拥护苏维埃国家。当然瞿秋白也如实地报导了苏维埃俄国革命初期的贫困，也流露出自己害怕艰苦生活的情绪，但不能说是丑化苏俄。

这种实事求是地宣传有助于我国广大向往苏俄的进步人士正确地认识十月革命，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启发中国先进分子认真地考虑：中国怎样走俄国人的路。例如一九五五年茅盾就曾撰文讲到当时受到瞿秋白这些报导的影响，最初许多人认为十月革命后，俄国就一下子变成极乐世界，《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教育了人们，克服天真幼稚的幻想，清醒地认识革命的艰辛历程。

正因如此，这两本书出版后不久，就被军阀政府禁止发售了。

三、对促成和巩固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

瞿秋白一九二三年一月回国后，即积极从事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一九二三年七月瞿秋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参与制定了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会前会后，他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可从以下三方面说明。

第一、正确地评价了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

三大前后，瞿秋白撰写了许多评价孙中山国民党的文章，指出，无产阶级要促进国民革命，就应当有国民革命的中心，然而要造成运动的中心，必定要用社会已经有的实力，而中国已经有的革命的实力就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瞿秋白说这是“中国现有的革命材料”。这是由于孙中山一直不妥协地坚持反专制、反军阀和反袁世凯的革命斗争，“是中国民主派的先锋”。同时瞿秋白指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从同盟会开始是联合会党（下等阶级）成立的，是代表大多数下等阶级利益的政党。（《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向导》二十三期）（一九二三年五月瞿秋白对国民党的分析，未看到其成分的复杂性，还有资产阶级，官僚地主分子，这一点到一九二五年时逐步认识到。）

同时，还指出国民党的弱点：①“军事崇拜的习惯”，过去屡次斗争，只“依赖武力革命”，没认识到“平民群众的能力”，现在这一点开始觉悟了；②会党出身有宗法社会的影响；③“模糊的革命主义”，不能有明确的革命政纲等等（《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九二三年九月《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因此瞿秋白说：共产党应当“根据现时实际经济动向而改造国民党，使从模糊的革命主义进于真正的民主革命及民族革命主义，那时的国民党方才能做国民运动的中心。”（同上）

瞿秋白起草了三大党纲草案，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表达了瞿秋白上述基本观点。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一大宣言是由鲍罗廷起草，廖仲凯、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参加，这个宣言原稿是从莫斯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寄来的俄文稿，由瞿秋白翻译，其中几段汪精卫改写过。

第二、正确分析了统一战线中各个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

瞿秋白回国后，努力用马列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他指出中国社会是宗法式的农业国，同时出现了商业资本。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五四运动“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并阐述了新时期的特点首先是：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是第一次群众性质的反帝运动，五四时的群众组织，用直接革命手段进行斗争；其次，五四以后，工人阶级觉悟，开始宣传社会主义，建立工会组织。（见《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向导》一一二期）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怎样实行呢？就是“向群众间去”，自下而上地发动工农群众。

瞿秋白并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

① 工人阶级。一九二三年时，瞿秋白指出工业无产阶级很少，大半不脱宗法社会的遗毒，现时只有民族主义觉悟。但铁路、纺织、海员工人受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压迫最深，最易组织，可以参加民主革命作革命的“实力后盾”和“主干”。（《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前后，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走上历史舞台，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他说：“民族运动里，只有无产阶级最先进，”（《帝国主义的佣仆与中国平民》，一九二五年二月《向导》一〇四期）“已经自觉的来参加民族革命，而且要做革命中之领袖阶级。”（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又说：工人运动发展的实践证明是“无产阶级领导着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九二五年六月《向导》一一九期）由此可见，在一九二五年初，瞿秋白已正确地提出了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附带说两句，邓中夏同志则更早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一九二三年“二七”后在《论工人运动》一文中指出工人

阶级是“主力军地位”，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中国工人》第二期上发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一文，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状况后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因此，在讲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时，也应当讲邓中夏，瞿秋白的论述。）

② 资产阶级。一九二三年七月时，瞿秋白分析中国资产阶级受军阀、帝国主义压迫，“要自力发展，非去军阀不可，非去帝国主义不可”，要去此二者，就要借重中国劳动平民和世界无产阶级，所以就非对社会主义让步不可，这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前锋》第一期）但是资产阶级由于受帝国主义压迫，比较软弱，比劳动阶级更软弱。（《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前锋》第一期）到一九二五年后则进一步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但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而且还有破坏联合战线使革命失败的可能性，从而说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的必要性。（见《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月刊第三期）

③ 农民。一九二三年瞿秋白在三大党纲中虽写上中国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但当时对农民的作用是认识不足的。五卅运动后，逐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与农民运动联合的重要性。一九二六年八月瞿秋白在广州作题为《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的讲演（系手抄本）指出：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谁解决此问题才能领导中国革命。把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问题联系起来了。

总之，在一九二三年至二五年期间，瞿秋白就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指出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袖阶级，工农劳动者是革命的主力

军，资产阶级是软弱、妥协的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所以瞿秋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确路线的代表者之一。

第三、为巩固统一战线，批判统一战线中右派的反动理论。

瞿秋白为了巩固统一战线，对统一战线中各种右派理论，写了许多论战文章进行系统的批判。

一九二四年七月瞿秋白写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批判实验主义。实验主义是一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它否认理论的重要性，否认科学真理。瞿秋白尖锐指出：哲学上，实验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只要合乎需要，宗教亦是真理；政治上，实验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劳动阶级彻底改造现有制度。瞿秋白在论战中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工人运动高涨，国民革命运动中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一批一批地分裂出去。瞿秋白同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和戴季陶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二五年八月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九二六年一月写了《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等长篇论文，系统地揭露批判了他们共同的政治主张是反苏反共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瞿秋白详尽地批判了他们的反动观点后指出，这些右派思潮的出现，表明国民革命中阶级分化的开始，结果只能使大多数革命青年和劳动阶级更加确定自己的革命意志，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指导，巩固革命联合战线，这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并且预言：“只有极少数的反动‘领袖’将来完全倒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土豪的怀里去，变成明显的反革命党。”

只有和右派作坚决的斗争，才能巩固统一战线。

四、批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和陈独秀、彭述之在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陈独秀的主要理论家是彭述

之。理论路线斗争的公开化是在一九二七年初。一九二七年三月瞿秋白写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四月二十七日党的五大开会时，每个代表的座位上发放了这本小册子，第二页中间写着“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下面写着“孟什维克主义”。恽代英看了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陈独秀看了很不满意，彭述之生气说：“这是见了鬼”。这本小册子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瞿秋白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坚决的，他曾说：“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在当时，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是要有很大勇气的。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瞿秋白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要在党的领导下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作为进攻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的主力军，取得革命领导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他说：“尤其重要的是不仅反对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捣乱政策，而还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软化”，我们不是简单地推翻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是“夺取”其领导权，明确指出争夺领导权的对象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戴季陶派、虞洽卿派。我们的任务是：组织民众武装暴动和兵民运动，响应北伐战争，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组织国民党左派运动等等，逐步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

文章批判了彭述之的“天然领导”论。彭述之也太讲无产阶级领导权。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彭述之在《向导》发表了《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说“工人阶级天然的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所以是“天然领导者”，是因为彭述之的根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他说民族资产阶级起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的事，若望他来作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宁非梦想，所以民族资产阶

级的势力“几等于零”，是“似有实无的鬼”。只有买办资产阶级霸占国民革命军的军权，他们不能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所以领导权“客观上”已在工人阶级之手，是“天然的领导者”。因此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北伐前反对北伐，主张等三亿农民起来暴动，北伐后主张准备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任务，拱手把领导权送给资产阶级。瞿秋白批判了上述谬论之后指出，实际上戴季陶主义、虞和德的改良主义（中国公论报）都是资产阶级企图夺取领导权以破坏革命的表现，并不是“似有实无的鬼”。

第二、关于农民政纲问题。

瞿秋白系统地批判了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说：“我们以前对农民的政纲和策略是错误的。”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党纲草案中瞿秋白提出：“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后被陈独秀改为“不得农民参加，革命很难成功”，而且只提“议租和乡村自治”。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央扩大会议，继续提乡村自治口号，对佃农只提反对苛税，不提减租问题。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四大重复上述口号，又提出“不宜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一九二五年九月中央扩大会议，才提出耕地农有的标语。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扩大会议，指出广东农民要求政权，但却提出要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防止分化过早，于是规定农民武装“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组织”。总之，是怕农民革命破坏与资产阶级的联盟。瞿秋白在文章中旗帜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革命中的中枢是农民革命”，要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建立农民政权，支持农民自己起来动手占据耕地，他说：“这种暴动不是革命党人所怕的，我们应当努力去组织这种进攻”。

在农民问题上，瞿秋白和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坚决地支持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革命路线。毛泽东的《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在《向导》第一九一期发表，只刊登到十四件大事前就被彭述之压制，不准继续连载了。四月间，瞿秋白看到这个调查报告，表示十分赞同，在他主持下，把报告全文出版单行本，书名为《湖南农民革命》，四月十一日深夜二时，他亲自为此书写序，热情歌颂湖南农民要求政权的革命斗争，他说，湖南的农民革命“实在是‘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的“过分论”。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立场，指出：“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第三、主持八七会议，清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二七年八月，瞿秋白主持中央紧急会议，彻底清算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正确方针，是有功绩的。

五、文化工作上的贡献

瞿秋白一九二八年八月去莫斯科参加六大，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〇年八月回国，批判立三路线时取调和态度，受到王明路线的严重打击，一九三一年一月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但是瞿秋白并没有离开革命，在上海养病期间，和鲁迅在一起参加上海文艺界反“围剿”斗争。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他撰写和翻译了二百多篇文章和译著，其中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五十多篇，文艺杂文一百多篇，政论文章六十余篇，其中有些是长篇论著或译著。鲁迅对瞿秋白的译文水平，盛赞不已，评价很高，亲自为他编辑出版《海上述林》。瞿秋白的译著，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他的杂文，象锋利的匕首，

投向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政策，有力地回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瞿秋白在这期间指出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路线的一些重要问题。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瞿秋白写了《论大众文艺》的论文集（包括六篇论文），提出了“大众文艺”口号，分析了中国文艺现状和进行文艺革命的方针和办法，代表了三十年代无产阶级的文艺斗争的正确方向，对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毛泽东同志对三十年代的文艺运动，曾作了如下的评价，他说：“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瞿秋白在《论大众文艺》一书中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文艺为谁服务，文艺和政治的关系。

瞿秋白明确指出：“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正是总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又说：“文艺应当是改造社会的整个事业之中的一种辅助的武器”（《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因此“文学家应当给群众服务”，一方面是“组织自己的队伍”，首先是以写工人阶级、农民、兵士的生活和斗争为主要题材；另一方面的任务是“捣乱敌人后防”，即描写地主资产阶级的丑态，揭露敌人，这是“捣乱敌人后防”的游击队。他提出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即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

第二、怎样为大众服务？

瞿秋白提出：①革命作家要了解工农群众，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到街头去开展“街头文学运动”，组织“工农通信运动”，去体验工人、贫农的生活和斗争；②要创造群众容易接受的新形式和新内容，可以利用旧题材改作成革命斗争的“演义”，如“新

水浒”、“洪杨革命”、“广州公社”、“朱毛大下井冈山”等，用说书、鼓词等形式宣传革命内容。

第三、文艺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瞿秋白认为文艺大众化问题“这是争取文艺革命的领导权的具体任务”，无产阶级要开展有系统的斗争去开辟文艺大众化的道路，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权。

为此就要对文艺战线上的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瞿秋白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胡秋原、苏汶的“第三种人”的谬论，他们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提出“不准侵略文艺”的口号，实际上是帮助了敌人“围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瞿秋白还批判了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种种意识形态，如“团圆主义”、“青天白日主义”，“脸谱主义”等。此外瞿秋白也批评了自己队伍中知识分子轻视群众、脱离群众的错误态度，鼓励他们决心走进工人阶级队伍。

瞿秋白关于文艺革命的论述是很卓越的见解，代表了三十年代文艺革命的正确方向。当然在当时上海的条件下，不可能付诸实施，应当肯定他对我党的文艺革命是有贡献的。

六、对瞿秋白盲动主义错误的看法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在瞿秋白主持下，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第一次统治了全党，虽然只有半年，但危害了党的事业，他开了“左”倾路线之先，助长了党内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他未能正确地贯彻八七会议的正确方面，实现全党的革命战略的转变；盲动主义使革命力量进一步受到打击，遭到可以避免或可以减轻的损失。而且在党内开始发展了惩办主义，惩罚了八一起义、广州起义（除张太雷牺牲外）的领导人，错误地批判了毛泽东不打长沙，进军井冈山是什么“右倾逃跑主义”等等。

关于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应当进行充分的批判，我